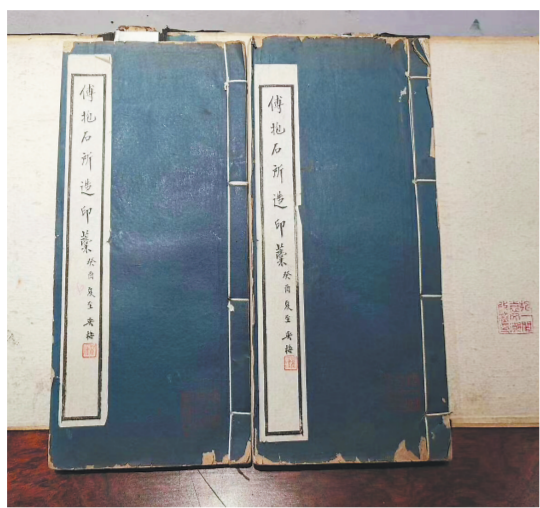


艺术热点

南昌发现傅抱石手拓印谱

□ 陈米欧



吴瞿安题签的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



《悲鸿》



《黄侃印》



《天翼》



《当其无有书之用》

最近，傅抱石于1933年手拓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(上、下册)在南昌出现，引起收藏界、学术界关注。笔者从我省一藏家手中借来翻阅之后，意识到该印谱十分珍贵，值得深入研究。目前，它除了能展现后来担任过西泠印社副社长傅抱石的篆刻艺术功力外，还可以通过此印谱的一些信息，尤其是大量姓名章，来印证傅抱石在南昌时期的“朋友圈”，进而从一个侧面来探寻他在南昌的生活、习艺等情况。

傅抱石痴迷的第一门艺术便是篆刻艺术，该手拓印谱就是一个证明。印谱封面题签“傅抱石所造印谱”为词曲大家吴梅(字瞿安)所题，扉页题签者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黄侃。按说那时傅抱石还只是在南昌有知名度，且从年谱等记录看，傅抱石早年并未与吴瞿安、黄侃这样的

著名教授有交集，却能得到这两人的手迹，有人猜测是傅抱石早年国文老师王易出面求来的。按《傅抱石年谱》记载，1933年6月，傅抱石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后，从上海转去南京拜访了恩师、国学大师王易。当时王易在中央大学任教，同事及好友中就有名教授吴瞿安、黄侃、汪辟疆等。可以合理想象一番——傅抱石去拜访王易之日，王易正和吴瞿安、黄侃等人饮酒唱和；谈到印谱事，王易便顺势向两位同事推荐小他15岁的傅抱石，并赞其印如何之好，于是，两位大家便给这位青年才俊的印谱题签……从吴瞿安的题签“傅抱石所造印谱”落款中的时间“癸酉年夏至”可知，题签时间为1933年6月22日，这也与记载中傅抱石赴南京拜访王易的时间吻合。

当年7月，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

(上、下册)面世，收印120余方。这其中，首先是傅抱石给老师辈的教授们所刻的印章，如“黄侃”姓名印一枚；吴瞿安有两枚，分别是“瞿安”“瞿安倚声”；汪辟疆的多，计有“汪辟疆印”“辟疆版印”“辟疆读后”“辟疆校读”“彭泽汪辟疆藏书印”“彭泽汪辟疆收藏金石书画印”等。从这里可看出，傅抱石与中央大学的一批名教授关系不错，为他们刻了不少印章，同时也得到这些名家的认可及题签的“加持”。除了名教授群体外，傅抱石“朋友圈”里还有对其命运带来重大改变的艺术界、政界等关键性人物，如徐悲鸿、陈立夫、熊式辉、彭醇士、罗时实、廖国仁、廖季登等，他们都是当时极力帮助傅抱石出国留学的人。这一群体中，傅抱石给徐悲鸿刻的印较多，显示了他与徐悲鸿较为密切的关系，其印分别有“悲鸿”“徐悲鸿”“当其无有书之用”“当其无有文之用”“未能免俗”等。另外，傅抱石给陈立夫、陈果夫各刻有一方姓名印；给熊式辉则有大小不同的两套印，均刻“熊式辉印”“天翼”，“天翼”为熊之号；罗时实是傅抱石的“总角之交”，除了刻有两方姓名印一朱文、一白文外，还有“佩秋”字号印；给彭醇士刻的也比较多，有“彭醇士”“醇士”“高安彭氏”“三十后以字行”等；给当时江西省裕民银行行长廖国仁刻了“廖国仁”姓名印；给廖国仁侄子、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廖季登刻有“廖季登玺”。

据记载，熊式辉在民国时期曾资助傅抱石赴日留学。当下流传的一种说法是，先是廖国仁、廖季登叔侄俩将傅抱石推荐给徐悲鸿，做了一次极其重要的“牵线搭桥”。之后，徐悲鸿向熊式辉提出，请其资助有才华的傅抱石去国外留学。当然，徐悲鸿虽有提携后进的诸多轶事，但在傅抱石出国留学之事上，并不见得仅靠其一人之力。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万新华在《关于傅抱石早年经历的若干细节》一文中指出，傅抱石的近邻及好友罗时实，在帮助傅抱石留学日本“发挥非一般的作用”。此外，在傅抱石的一份自述材料中提到，南昌名士彭醇士在1932年也曾向熊式辉进言资助傅抱石留学一事。当时，彭醇士与刘太希、陈方并称为“江西三才子”。

印谱中，还有一些是傅抱石在南昌的同事和朋友，这些人多半跟其有交集或曾给予其帮助。如“奉新宋育德字公威”是为江西省第一中学的创办人宋育德刻的；“黄光斗”有朱文、白文各一方，是给曾任江西省立第一

师范学校校长黄光斗刻的；“陈际唐”是给省立南昌一中校长陈际唐刻的；“詹松涛印”是给好朋友、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跋文作者詹松涛刻的；“润如经眼”应是给扫叶山房主人姜润如刻的；等等。这些印章背后，也有很多故事。如爱才的校长黄光斗，早年傅抱石仿刻赵之谦、陈曼生等名家印章被买家识破并找上门来理论，他不仅妥善地将对方打发回去，平息了风波，后来还在报纸上公开为“抱石斋主人”招揽生意：“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黄光斗介绍抱石斋主人治印，每字五角，接件处师范学校传达室。”姜润如是傅抱石的“忘年交”，也是古旧书店的主人。傅抱石曾在他的店里买到了珍贵的黄牧甫原拓印谱。

笔者从藏家那里初见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时，篆刻、收藏及史学界几位好友也在场，一起品鉴、讨论后，尚存有一些疑惑。首先，此印谱是手拓还是制版印刷？经过辨认印泥成色、纸张上印油渗化等表现，大家一致认为原印手拓。接着，问题又来了：如果是手拓，那拓印了多少本？因为印谱中许多印是姓名印，一般来说，姓名印刻好后就该很快交给对方，交给对方前自己留样手打印泥，一般数量不会很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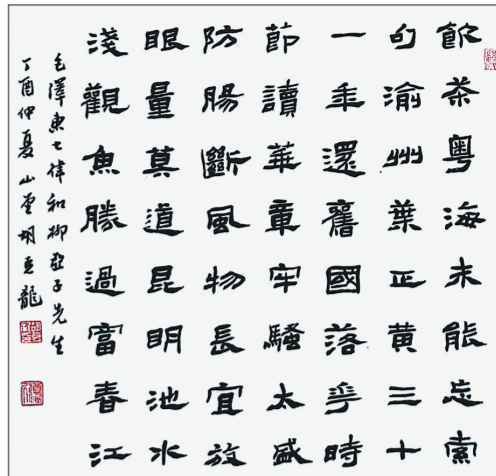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后来新发现的资料，这些疑惑自然解开。南昌一位青年学者给笔者提供了一份《民国日报》扫描图片。此图显示，该报刊当年刊登了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的发售广告。其售卖重点信息为：“黄侃先生、吴梅先生题署，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精拓二册一函，实价银洋六元。”此外，文字推广内容还有：“抱石先生所造晶牙铜石诸印，庄凝朴茂，别饶逸气，万金一字，得者宝之。本社特商请先生将近顷为当代名贤所制者精拓百数十方，钤拓成谱，以广流传，计书百部，现发则半数。南昌百花洲五十号文艺社。中山路大东书局代售。”这里透露的关键信息是，傅抱石当年制作的该手拓印谱，共计100套。

13年后即1946年，傅抱石在重庆回忆自己痴迷篆刻艺术的时候，也提到该印谱的数量。他给一艺术品经纪人写信时写道：“弟于刻印曾迷恋二三十年……民国二十一年，曾选拓成谱，钤百部售之，今手中也无片楮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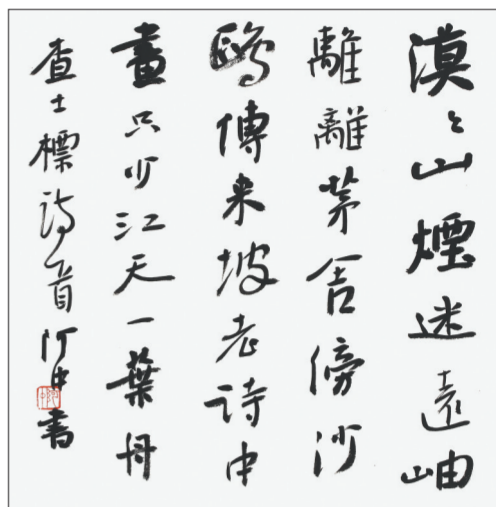
看来，傅抱石对制作印谱还是早有准备。该印谱中的印章，很可能当时他每刻完其中一枚，就立即盖了上百张印泥，以便订成册。仅仅100套，80多年后的今天，又能幸存多少？其珍稀性可想而知。

(配图篆刻选自《傅抱石所造印谱》)

艺术天地



柳亚子先生《毛泽东、和胡克龙书》



行书《查士标诗》周继中书



行书团扇《鄱道元·黄牛滩》刘小明书

艺术随笔

座右铭中见大师风骨

□ 胡胜盼

座右铭本指古人写出来放在座位右边的格言，如今泛指激励或警戒自己、作为行动指南的格言。南朝梁萧统《文选·崔瑗(子玉)座右铭》有吕延济题注：“瑗兄璋为人所杀，瑗遂手刃其仇，亡命，蒙赦而出，作此铭以自戒，置座右，故曰座右铭也。”唐代诗人白居易很佩服崔瑗，曾在《<座右铭>序》中写下：“崔子玉《座右铭》，余窃慕之，虽未能尽行，常书屋壁。然其间似有未尽者，因续为座右铭云。”

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，他的座右铭是“饮冰”。从1899年起，梁启超还把自己书斋的名字定为“饮冰室”，可见“饮冰”座右铭在他心中的分量。“饮冰”一词源于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：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，我其内热与？”原意是比喻自己内心的焦虑。梁启超生活的年代，正是国家内忧外患之时。面对国家前途的何去何从，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，因此他要以“饮冰”来解内热，积极宣传变法强国。

林语堂是现代散文大家，他的散文风格冲淡平和，读之如春风拂面。他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是：“此处果有可乐，我即无所思。”因此，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“有不为”。有不为方能有所为。大师深知人生苦短，只有有所摒弃，才能有所精进。

叶圣陶曾把自己的书斋题名为“未厌居”。“未厌”就是他的座右铭。未厌，即没有厌弃。人生一世，总会经历潮起潮落、坎坎坷坷。面对艰难困苦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，更不能悲观厌世，而是要以积极乐观的精神直面生活风浪，跨越一个又一个难关，享受生活，珍惜生命。未厌，也含有对学习和工作永不满足之意。

季羡林是名宿大儒。他的座右铭是四句诗：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这首充满禅学哲思意境的诗作，出自陶渊明长诗。季羡林借用前人诗句，高度概括了自己的人生哲学：人应该自由忘情地活在宇宙自然中，遇喜淡然，遭祸泰然，应做什么就尽兴而为，该离去时就坦然离去，不用患得患失，忧虑重重。

大师们的座右铭，言简意赅，启人深思，从中可窥见他们卓尔不群的风骨。



特别策划·赏作品鉴藏品学党史 之名作篇

情深意切送红军

——靳尚谊油画《送别》赏析

□ 郑学富



油画《送别》靳尚谊绘

读著名画家靳尚谊的油画《送别》(如图)，那首悠扬而凄婉的江西民歌《十送红军》犹在耳畔。

1934年10月，由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瑞金，踏上漫漫长征路。苏区人民得知红军要长征后，依依不舍，满怀热泪送红军。位于于都县境内的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，河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波涛汹涌。

于都人民为了红军顺利渡河，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，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，汇集了数百条大小船只。为了架设浮桥，于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、床板，一位老大爷甚至把自己的寿材也送到了架桥现场。为了不暴露红军的战略意图，避免敌机轰炸，架桥都在夜间进行。当时周恩来感慨地说：“于都人民真好，苏区人民真亲！”红军即将渡河时，乡亲们扶

老携幼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把煮熟的鸡蛋、热气腾腾的红薯、竹叶包的饭团装进战士的口袋。即将远征的红军将士依依惜别送行的乡亲们。靳尚谊的油画《送别》反映的正是这一情景，已成为表现红军长征题材的经典之作。

这幅油画创作于1959年。靳尚谊当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画系不久，又结业于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，留校工作。他接到创作任务后，于1959年10月，深入到井冈山、瑞金等革命老区体验生活。他访问老红军、老赤卫队员、老农民，聆听他们讲述当年红军长征的故事。他在当地写生，画了那里的山山水水，画了那里的妇女、青年、老人等人物形象，收集了大量素材，回去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创作。

此作在构图上，作者选择秋天一个雨后的黎明时分，天色阴沉，秋风萧瑟，一条大河横亘前方，河对岸是崇山峻岭，莽莽深林，红军正在通过临时搭建的木桥向河对岸走去。留下来坚持打游击的赤卫队员高举手中的梭镖，向战士们告别。画家注重对军民细节的刻画和离别时复杂心情的表现。脚下是苏区褐色的泥土。一位老大爷把儿子交给红军干部，请求参加红军。红军干部拍着小小伙子坚实的肩膀，似乎在向大娘说：“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！”一位妻子在和身着红军服的丈夫话别。丈夫抱着孩子，正在叮嘱妻子在家里要孝敬老人，照顾好孩子。还有一位姑娘抹着眼泪告别自己的未婚夫；一个女青年提着篮子送来了饭食；一个小伙子拉着红军战士的胳膊有说不完的话……画面人物生动，情节感人，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。